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基本情况调研文集

主编 潘家玮

研究出版社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基本情况调研文集

主编 潘家玮

北京·研究出版社

责任编辑 闻余
责任校对 求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浙江在外投资创业基本情况
调研文集/潘家玮主编. —北京:研究出版社,2005. 6
ISBN 7—80168—185—1

I. 跳… II. 潘… III. 投资—调查研究—浙江省
—文集 IV. F832. 7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7259 号

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基本情况调研文集

潘家玮 主编

研究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 1746 信箱 邮编:100017 电话:010—63097512)
浙江省委办公厅文印中心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345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168—185—1
定价:29.00 元

主 编:潘家玮

副 主 编:王小玲 郑宇民 姚少平

执行主编:沈建明

编 辑:张国强 项德恩

徐 芳 陈国强

序 言

2005年

浙江人素有外出务工经商的历史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大批浙江企业和浙江人走出浙江,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投资创业,形成了倍受各界关注的“浙商现象”。如何深入研究“浙商现象”,做好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篇大文章,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浙江是一个陆域小省,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发展空间有限。过去的二十多年,我省始终把强省与富民结合起来,凭借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体制机制优势,依靠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充分发挥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抢占了发展先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期间,活跃在全国乃至世界各个角落的天下浙商功不可没。实践充分表明,大批浙江企业和浙江人对外投资创业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浙江发展,有利于全国发展。

必须看到,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我省原有的部分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宏观层面看,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日益尖锐,要素瓶颈制约不断加剧,产业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紧迫。从微观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企业发展空间受到较大限制,资本营运成本上涨过快,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这种环境下,我省要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个战略必须始终贯穿于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我们各项决策和实际工作中。

为了全面把握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特别指示省委政研室牵头组织省有关部门、驻外办事处,部分市、县(市)开展在外浙江人投资创业情况专题调研。专题调研比较扎实,形成了一批很好的调研报告。报告中的观点和数据要不断宣传,以统一全省思想,深化认识,把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落到实处。

2005年3月

目 录

序言

树立战略思维拓宽发展视野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调查报告	(1)
对“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问题的理论研究	(7)
对外投资理论与浙商对外投资	(27)
浙江人在境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41)
浙江企业在外投资创业情况抽样调查报告	(50)
浙江人在京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54)
浙江人在津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61)
浙江人在晋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69)
浙江人在沪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73)
浙江人在粤琼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80)
浙江人在深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85)
浙江人在闽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90)
浙江人在辽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93)
浙江人在渝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96)
浙江人在川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04)
浙江人在滇黔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09)
浙江人在湘豫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13)
浙江人在东北地区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16)
浙江人在苏鲁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20)
杭州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25)
宁波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32)
温州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39)
湖州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47)
嘉兴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52)
绍兴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60)
金华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67)
衢州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76)
舟山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82)
台州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85)
丽水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93)
象山县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198)

乐清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00)
平阳县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06)
诸暨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14)
东阳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18)
义乌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23)
温岭市在外投资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227)
后记	(232)

树立战略思维拓宽发展视野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调查报告

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对浙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全面摸清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情况,根据省委主要领导的意见,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 11 个市、6 个省直部门、7 个省政府驻外办事处、7 个县(市),就在外浙江人投资创业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期间,我们会同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省工商局组成四个调研组,分别赴东北三省、湖南、河南、山东、江苏、贵州、云南等省实地调研,并对在外 1000 家浙江企业和省内有对外投资的 1000 家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总体情况

浙江人历来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传统,历史上,宁波帮、龙游商帮等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人口跨区域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但仍有一大批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务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领域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走出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从国内到国外的对外投资创业之路,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经济现象。

综观浙江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投资创业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一大批浙江人,主要是浙江农民,迫于生活压力,在人口跨区域流动限制有所松动的条件下,纷纷到全国各地从事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等务工活动。80 年代中期以后,我省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小商小贩和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迅速增加。这批人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不以利厚而趋之,不以利薄而弃之,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到 80 年代后期,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在省外经商办企业,从事商品销售等经营活动。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 年浙江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100 万左右。这一阶段,浙江在外人员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二是整个 90 年代。随着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间资本的不断积累,浙江人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拿着 80 年代掘到的第一桶金,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继续在全国各地开辟市场,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台州街”等,并开始 in 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同时,一部分浙江的大企业,如娃哈哈等开始在中西部进行大规模投资,显示出浙江人厚积薄发的态势。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 年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 207 万左右。这一阶段,浙江在外人员主要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三是 2000 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北上南下、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

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国有企业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据本次调查,截止2003年底,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400万左右,其中经商办企业人员约200万;在外企业约9万家,个体工商户约70万户,注册资金约2350亿元,对外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资金约800亿元,2003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这一阶段,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主要是“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

从调查情况看,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有五个基本特征:

(一)从区域分布看,浙江的对外投资,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多。调查显示,在外浙江人的足迹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区,但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据初步统计,到2003年底,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江苏、福建、海南等8个省市,浙江人累计投资约3300亿元,约占浙江人在外投资总额的62%,其中上海1700亿元,约占总额的32%;东北三省累计投资约420亿元,约占浙江人在外投资总额的8%;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等7个中部省份累计投资约820亿元,占总额的15.4%;四川、云南、新疆、青海等12个西部省份累计投资约780亿元,约占总额的14.6%。

(二)从投资领域看,浙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浙江对外投资的领域近10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以前,浙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商贸流通。2000年后,浙江对外投资的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触角已伸向农业、工业、建筑、房地产、商贸、物流、餐饮、基础设施等各行各业,但仍以第三产业为主。据对1500家在外企业的抽样调查,从事第一产业的38家,占总数的2.5%,投资总额约10亿元,占总额的2.3%;从事第二产业的612家,占总数的41%,投资总额为154亿元,占总额的33.6%;从事第三产业的850家,占总数的56.7%,投资总额为293亿元,占总额的64%。据上海办事处调查,浙江在上海的投资,三产比重达70%以上;据温州市统计,温州人在外从事三产的比重约为83%。考虑到2000年以前浙江在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估计我省在外投资总额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占75%以上。

(三)从资金来源看,浙江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是早期在外经营的积累。根据我们调查,80年代浙江在外创业人员主要从事务工活动,资金输出极少。90年代浙江输出的资金逐步增加,但总量也不大。2000年以后,随着浙江在外投资逐步从商贸流通为主向制造业、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浙江输出的资金大幅度增加。但总体上看,浙江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是多年在外经营的积累。据温州调查,温州在外投资总额近2000亿元,其中本地输出资金约500亿元;据上海办事处调查,浙江在上海的1700亿元投资中,浙江输出的资金约400亿元;深圳办事处反映,浙江在深圳的投资约250亿元,其中浙江输出资金为15亿元;据对在外的10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当地金融机构的贷款约占企业总资产的12%,当地人的投资额约占企业所有者权益的9%。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判断,在浙江对外投资总额中,浙江输出的资金大约占15%~25%,当地金融机构的融资约占10%~15%,5%~10%是当地人的投入,50%~70%是浙江人多年在外的经营积累。

(四)从企业规模看,浙江在外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根据外省工商局反馈的资料,我省在山东、云南、湖南、广西等13个省区中,共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49501户,其中,个体工商户为110432户,占73%。据我们对在外1000家企业的调查分析,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占35%,年销售收入500~1000万元的占14%,1000~3000万元的占26%,3000~5000万元的

占7%,5000~10000万元的占8%,1亿元以上的占10%。考虑到我们调查的企业都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企业,实际上中小企业的比重远高于抽样调查揭示的情况。

(五)从经济关联度看,浙江在外企业与浙江经济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据各地调查,我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3000亿元左右,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抽样调查表明,在外企业中,原料或货源来自浙江比例超过50%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34%,30%~50%的占22%,10%~30%的占22%;产品返销浙江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8%,30%~50%的占12%,10%~30%的占26%。进一步分析表明,我省在外企业中,以拓展市场为主要目的占企业总数的66%,以获取原材料为主要目的占14%。同时,相当一批企业将部分利润汇入浙江,或做强做大后返回浙江投资。据黑龙江省工商局统计,在黑龙江的浙江创业人员汇入浙江的现金总额近几年累计达22.4亿元;据山东省工商局统计,在山东的浙江企业近几年返回浙江投资累计约15.5亿元,约占在鲁浙江企业注册资金总额的17%;据台州市统计,2003年全市吸引回归资金43亿元。

总体上看,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情况是好的,发展也比较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我省各地对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认识不统一,一些地方对外出投资创业态度比较消极,使不少在外投资创业人员得不到本地政府的支持和服务。二是省外部分地方投资环境不尽理想,使一些浙江在外投资创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三是在外浙江企业联合会覆盖面还不够广,在督促企业自律、强化信息沟通、服务在外人员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对这些问题,我们应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以确保我省对外投资创业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认识浙江企业和投资创业人员“走出浙江”现象

如何看待数以百万计的浙江投资创业人员和数以万计的浙江企业走出去现象,目前全省上下认识不一,还有不少误区。一些人简单地把企业“走出去”看作是资金外流、税源外流、人才外流,并认为会造成本地产业空洞化,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利,政府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还有一些人认为企业走出去是企业行为,应顺其自然,政府不必过问。我们的研究表明,浙江人走出去务工经商办企业,既是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大批浙江人走出去务工经商办企业,使浙江较早地熟悉了国内市场的特点及竞争规则,较早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较早地形成了一支创业大军和企业家队伍,并广泛传播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可以说,没有一大批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就没有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企业和投资创业人员走出去虽然有利有弊,但总体上利大于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浙江自身发展要求,符合企业自身扩张需要。

(一)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跨国或跨地区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1979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通过对6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时,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当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时,开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在1500—250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在2500—4750美元之间时,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加。如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对外投资开始启动,当年约为0.2亿美元;1988年韩国

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当年对外投资达到 4.8 亿美元;1997 年韩国人均 GDP 约 10000 美元,对外投资达到 44.5 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对外投资在 1998 年达到最高点(47.4 亿美元)后开始下降,1999 年为 25.5 亿美元,2000 年为 37 亿美元,2002 年为 26.7 亿美元。尽管邓宁的研究是针对跨国投资的,但也基本符合一国内部的跨地区投资。有关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部由于没有关税、汇率以及税制差异、利率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地区间的资本流动远比国家间的资本流动活跃。这意味着一国内部的跨区域投资在人均 GNP 低于 2500 美元时就可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3 年,浙江人均 GDP 超过 2400 美元,专家估计我省人均 GNP 已超过人均 GDP。按照邓宁的理论,我省正处在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阶段。因此,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大规模走出去投资创业,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里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资本等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比较小,这使得浙江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 GDP 与浙江接近的省份,甚至高于人均 GDP 大于浙江的省市。

(二)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 25 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成为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同时我省原有的一部分优势也在逐步弱化,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以及要素资源制约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土地资源紧张,可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总量仅 334.6 万亩;水资源紧缺,结构性和水质性缺水现象比较明显;矿产资源贫乏,许多矿产资源储备量在全国各省市区位居后列;环境容量较小,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等不断攀升,电力等重要原材料供给日趋紧张(据省有关部门调查,我省综合商务成本与上海相比,从 2002 年低于 16.2% 缩小到 2003 年的 10.2%;与江苏相比,从 2002 年高于 8.4% 扩大到 11.9%)。这些问题,一方面制约了浙江纺织、服装、制鞋、印刷包装、日用小商品、小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水平扩张,另一方面制约了水泥、化工等资源加工型产业以及能耗、水耗、地耗和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土地等资源要素硬约束的条件下,大量低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集聚,必然要影响精深加工型重化工业、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本次调查显示,我省在外工业企业年产值合计超过 1500 亿元。如果这些企业都在省内,以每亩产出 100 万元计(全省开发区平均为 47 万元/亩),至少要占用 15 万亩土地;以每 100 万元工业产值耗电 4 万千瓦时计(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 100 万元工业产值耗电 5 万千瓦时),至少要耗电 60 亿千瓦时。因此,要缓解要素制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鼓励、支持、引导部分产业和企业有序地走出去,特别是把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以及环保要求较高的产业转移出去,腾笼换鸟,将有限的发展空间让渡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土地的制约、环保的制约、能源的制约,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低附加值产业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走出去。因为这些产业劳动用工多、职工收入低,不走出去,一方面会影响我省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会造成外来劳动力不断增加,导致我省经济增长的各项人均指标滞后于总量指标,最终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城乡居民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走出去”是企业自身扩张的内在需要。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其流动增值没有国界、省界;企业是资本的载体,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从世界范围看,所有的大企业都是跨国经营的;从我国范围看,除石化、钢铁等行业部分

企业外,所有的大企业都是跨区域经营的;从我省的实践看,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突破原来的区域向外拓展。另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质,又使得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会向要素成本低、政策优惠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集聚,并通过对资产、土地、品牌、商业网络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来推进结构调整。有些企业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质,必须在全国各地布点。如水泥行业,一般销售半径仅几百公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若要继续扩张,必须走出去再建新厂。部分饮料行业也有这个特点,如饮用水。有些企业做大后,为了构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营销网络,也必须走出去布点,如服装、日用小商品等。还有一些产业,由于其产品只能就地消费,不可运输,企业要扩张也必须走出去,如房地产。更多的企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走出去投资办厂。此外,企业成长后若要向矿产开发、水利开发等特殊领域拓展,也必须到有资源的地方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发展之路就是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总体处于卖方市场的背景下,我省许多企业从零起步,凭借机制上的先发性优势,利用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1978 年我省年销售上亿元的工业企业寥寥无几,去年已接近 2000 家,其中年销售上 10 亿元的企业近百家。这些企业,一方面已经具备了走出去投资的条件,另一方面,其中有相当一批企业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广厦、万向、娃哈哈、雅戈尔、正泰、德力西等企业,都经历了成长、走出去、进一步壮大的过程,目前分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第 6 位、第 7 位、第 11 位、第 12 位、第 13 位和第 15 位。杭州华立近几年走出去收购兼并了重庆仪表、恒泰、昆明制药等 3 家上市公司,并在省外组建了多家企业,目前名列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第 24 位。上海埃力生集团原为慈溪一家从事轻型钢管生产的企业,1997 年迁至上海,去年营业额达到 450 亿元。

但我们也要看到,大批企业走出去投资创业,必然会给浙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看待负面影响,关键是二个问题:

第一,企业走出去后腾出的发展空间,是否有相应规模的高技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等产业来填补。如果腾出的发展空间仍由传统产业来填补,企业走出去就没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功效。因此,企业走出去负面影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省高技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快慢。

第二,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后,是否会回浙江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或新兴服务业。这里如果不考虑企业自身因素,主要是看浙江是否有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及新兴服务业的环境、氛围和条件。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省相当一部分企业做大后把总部迁往上海等地,这也要看浙江是否能够逐步形成有利于大企业总部运作的环境、氛围和条件。

三、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的建议

在外浙江投资创业人员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选择。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以战略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务实的态度,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引导浙江人走出去投资创业。

(一)理顺管理体制。参照上海做法,建立由省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省经济技术协作办、省工商局、省工商联等省级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国内经济合作交流联席会议制度,下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情况综合、政策研究、联络协调,并检查督促联席会议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的进展情

况。外出投资创业人员比较多的市也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高层互访磋商机制。每年有计划地安排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的党政代表团到我省在外投资创业人员比较集中的省份考察,进行高层交流。同时,通过建立友好市、友好县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县、市之间的交流。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加强与外省市的工作沟通。

(三)加强在外企业联合会或商会建设。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2年内在全国各省市(除西藏)都成立浙江在外企业联合会。积极引导在外企业及各县市商会加入浙江企业联合会,进一步规范组织体系,完善组织功能,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能力,及时为浙江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提供信息、咨询、协调、维权以及融资等方面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浙江在外企业联合总会。省政府各驻外办事处要加强对所在地浙江企业联合会的指导,积极主动地做好在外浙江企业和创业人员的服务工作。

(四)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全面落实《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继续实施《关于我省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意见》,用好省财政每年500万元的专项资金;研究制定我省参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建设的政策,对走出去开发省外资源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政策补贴。加强对在外创业人员政治上的关心,各地在推举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人选时,应考虑有突出贡献的在外创业人员。建议省政府在适当时候举办“浙江在外创业人员经验交流会”,表彰一批在外优秀企业和创业人员。

(五)加强对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的服务。加快“三网三库”(政府联系网、系统联动网、企业联络网,信息库、数据库、项目库)建设,加强对省外各地政策动态和信息动态研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继续主办“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和“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完善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对在外创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在外浙江人的诚信意识、经营水平和维权能力。

(六)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利用省内外多种媒体和宣传手段,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树立浙江人“讲诚信、善经营”的良好形象,不断提高省外各地对浙江和浙江人的认知度。省内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宣传力度,开辟《浙江人在全国》的专栏和专题系列节目,大力宣传在外浙江人的成功经验和创业业绩,为在外浙江创业人员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七)积极引导在外浙江人回乡投资。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外企业和创业人员呼声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我省的投资环境还不尽理想。据省统计局调查,有59.6%的在外企业认为我省要提高政府服务意识,58.4%的在外企业认为要简化投资手续,42.2%的在外企业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对此,我们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抓紧研究制定吸引在外浙江创业者回乡投资的若干意见,对回乡投资的企业和创业人员在企业登记证、土地使用、税收征收、供水供电、融资贷款、子女入学等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省委政策研究室)

对“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问题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浙江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经济流动,大批浙江人相继到全国各地投资创业,谋求发展,对全国以及浙江本省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这一现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否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某种规律?它是否会给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各级党委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积极引导这一现象,促进浙江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省委党校组织了专门课题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将我们的分析及若干对策建议报告如下。

一、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历程

(一)悠久的外出创业传统。浙江人素有外出创业的传统。在浙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绍兴师爷、“宁波帮”、“龙游商帮”等外出创业群体。而浙江各地众多的能工巧匠,如东阳木匠、永康铁匠等,也往往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近代,浙江商帮的活动区域曾遍及全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说:“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进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二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亦在势力范围之内。”在解放前,浙江商帮在全国具有显著的地位。

由于地处沿海,浙江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前沿,宁波(古称明州)、温州乃至杭州、台州长期以来都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与对外通商口岸。由于对外经济交流相对频繁,浙江人漂洋过海、出境创业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在近代,浙江的国际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在20世纪30年代,浙江一批有实力的工商企业家经由沪、甬转往香港、澳门等地投资,经商办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批浙江人随陈仪接收台湾。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又有大批浙江人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长期的对外经济交流使浙江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环境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环境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外出创业的浙江人、浙江企业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知识青年下乡“支农”、“支边”运动外,浙江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除了部分企业在政府的计划下拆迁到内地外,基本上没有浙江企业外出投资创业。但是,由于浙江人多地少,就业压力大,为了生存,加上长期外出经商创业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些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如温州的弹棉郎、义乌的“敲糖帮”等地域性商人群体,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继续跨区域流动。在义乌,当地农民在经得生产大队、公社的许可后,可以在农闲季节持有政府开具的许可证到省内外收购鸡毛和各种废品。从这一时期浙江外出人口的地理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义乌、东阳等人地矛盾突出,生存压力较大的地区。杭州、嘉兴、湖州等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外出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少。由于这些走南闯北的浙江人经济观念强,对市场的反映快,他们带回的各种市场信息,直接导致了浙江许多专

业市场与特色产业的发生与发展,从而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与钮扣产业、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与小商品生产、柳市的低压电器、苍南宜山的再生腈纶产业都是在当地外出人口的推动下形成的。

(二)20世纪80年代浙江人的务工经商与企业的横向联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口流动逐年增加。20世纪80年代,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如个体经济被“正名”,传统集贸市场的全面恢复,农民从事非农产业限制的逐步放开,允许社队集体、农民个人进行长途贩运等,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各种壁垒逐渐被打破,导致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走出浙江,外出创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外出到全国各地创业打工的达200多万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这一时期浙江人外出创业的起点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商品销售、弹棉花、磨豆腐、配钥匙、卖眼镜、理发、补鞋等行业。与此同时,浙江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浙江人向外流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必须自己找原材料,找市场。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原料与市场两头在外,导致浙江的大批采购员、推销员在全国各地满天飞,在计划经济的空隙中为企业的发展寻找生存的空间。许多外出打工创业的浙江人也纷纷为家乡的企业提供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或者直接成为家乡企业的经销、采购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为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国家鼓励和提倡以企业为主体的横向经济联合。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一系列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针对浙江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格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区域经济协作与横向联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企业和省外企业之间横向联合发展迅速。许多浙江企业,如雅戈尔、罗蒙、培罗成、金洲、纳爱斯、茉织华等,通过与上海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得到上海企业在资金、技术和订单等方面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通过与省外企业的横向联合,得到企业生产必须的各种能源和原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建筑企业开始组织力量到省外尤其是上海承揽业务,在实现企业扩张的同时,也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外出。一些浙江企业开始在省外尤其是上海租赁摊位,开设产品销售的“窗口”。外出创业的大批浙江人也纷纷租赁摊位,销售各类浙江产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多数企业规模都较小,受经济实力的限制,进行跨区域投资的很少,基本上没有跨国投资。至1990年,浙江企业在国外只有一家贸易机构。

(三)20世纪90年代外出投资创业才真正开始起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为大量浙江人的跨区域流动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积累,浙江外出创业人员逐步从低层次的营销、服务转向市场建设与实业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人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北京京温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昆明螺丝湾市场、哈尔滨温州国际商城、乌鲁木齐义乌商贸城、兰州义乌商贸城、上海轻纺城、郑州温州商城等一批大型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兴建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浙江人外出创业,也促进了浙江商品在外地市场的销售。随着外出浙江人口的不断增加,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浙江村”、“温州城”、“台州街”、“义乌路”。一批在外投资创业人员逐步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有的浙江人甚至变更了户籍所在地。

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许多浙江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一些浙江企业开始进行跨区域扩张。1992年,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桐

庐皇家实业有限公司老板陈金义出资 145 万元买下了上海黄浦区 6 家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权,一时轰动全国,被媒体称为“陈金义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浙江企业,如娃哈哈、纳爱斯、正泰、德力西、雅戈尔等,为了加强对外地市场的服务与管理,纷纷在外地投资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形成全国性的营销网络。一些中小企业也纷纷在市场所在地建立营销网点。而一些以出口为主的浙江企业,如飞跃集团、宝石集团等,纷纷在国外投资设立各种贸易机构。到 1999 年,浙江企业在国外已经有 300 多家贸易机构。

在当时国家有关对口支援、对口帮扶政策的引导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鼓励下,一些浙江企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省外进行生产性投资。如从 1993 年开始,为响应农业部提出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浙江省相应成立了乡镇企业东西合作领导小组,鼓励浙江有实力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搞开发合作,向河南和新疆推出了近百个合作项目,带动了许多企业在河南和新疆进行投资。在国务院号召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确定浙江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涪陵市以后,在省市政府部门的积极组织推动下,娃哈哈集团、金义集团等一大批浙江企业先后在涪陵投资办厂,参与库区建设。在国务院组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确定浙江省对口帮扶四川的广元、南充两市之后,也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娃哈哈集团、青春宝集团、人本集团、一体童装等企业先后在广元和南充进行投资,参与当地建设。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激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走出浙江,在全国各地投资。如娃哈哈自 1994 年以来,投资 10 多亿元,先后在重庆、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 10 多个省市建立生产基地。华立集团通过一系列地跨区域投资、收购、兼并,不仅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而且实现了多元化扩张。雅戈尔自 1995 年以来,先后投资 5 亿多元,在全国建立了 300 多家直营的专卖店,成为全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一大批浙江企业通过跨区域扩张,实现了从区域性企业向全国性企业转变。正泰、德力西、康奈、庄吉等企业先后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成为无区域企业集团。而浙江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如万向集团、海天集团、茉织华集团,为了更好地占领国际市场,开始进行跨国的实业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装配基地,逐步向跨国公司转变。可以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才真正起步。为了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获得更高的利润,许多浙江大企业、大集团走出浙江,在北京、上海甚至是美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外地的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加快企业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务环境的变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商务成本等原因,开始通过跨区域投资进行战略转移,甚至是整体的迁移。如 1997 年,温州 100 多家灯具制造企业,整体搬迁到广东古镇。近年来,平阳编织袋生产企业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浙江的一些大企业、大集团由于本地发展环境的限制,把企业的总部,或者是企业的重要职能机构如投资中心、财务中心等搬到外地。如 1999 年,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在浙江的反响很大。后来,浙江又有许多大企业、大集团,如宁波的天一证券、埃力生、宏润建设、龙元建设,温州的天正集团、均瑶集团,嘉兴的茉织华集团等,把企业的总部迁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经济中心,沪浙经济联系历史悠久,关系密切,所以现在搬迁总部的浙江企业一般都把总部搬到上海。

这些企业虽然搬迁了总部,但一般都把生产基地留在浙江,从而形成总部在上海、生产基

地在浙江的企业格局,企业在上海接订单、决策,在浙江生产。

(四)21世纪全面走出浙江。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的经济总量与人均GDP一直稳居全国前列。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从2000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到全国各地投资创业。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形式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浙江许多大企业、大集团纷纷在外地进行生产性投资,2002年浙江百强企业有一半以上在投资所在地有投资项目。纳爱斯集团、奥康集团等企业是从2000年开始进行跨地区投资。一批浙江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与浙江省“两个推动”战略的鼓舞下开始进行跨国投资,温州的康奈集团、奥康集团先后在美国和西欧开设专卖店。浙江人外出创业也逐渐由务工经商向投资实业转变。浙江人与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现象,受到了全国的关注。许多省市,如四川、江西、云南、新疆等,都把浙江作为一个重要的招商引资对象,纷纷到浙江进行招商引资。

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商务环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地方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省内工业用地地价昂贵,而且由于土地指标紧缺,工业用地供不应求,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大量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不断向外地迁移。近年来,省内的供电、供水形势也十分紧张,明显影响了许多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地工人的工资不断上升,也影响了浙江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由于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些不利因素,一些浙江企业开始进行整体搬迁,或者搬迁企业总部。据浙江省工商局初步统计,目前全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浙江企业外迁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近年来,浙江人、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政府部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自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从2000年开始,连续5年,带领浙江企业家到中西部地区考察、投资。2000年8月在新疆、甘肃,浙江企业在163个项目中投资了63亿,2001年6月在四川、云南,浙江企业在224个项目中投资了77亿,2002年8月,在浙江的近邻——江西、安徽,浙江企业在287个项目中投资了247个亿,2003年8月,浙江企业又在青海的100个项目中投资了20多亿元,2004年6月,浙江企业在重庆的103个合作项目中投资了134亿元,在湖北的176个项目中投资了374亿元。省政府先后出台了“两个推动”战略、《关于浙江省参与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鼓励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外出创业,并与兄弟省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协调会议制度,通过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及时解决浙江企业外出创业投资面临的问题。

(五)在外投资创业的阶段划分。在外投资创业包含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两方面的内容。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现象。浙江人外出创业是个人行为,属于人口流动的范畴,而浙江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是企业行为,属于企业地理的范畴,两者的起因、表现的形式、发展的趋势各不相同,但是浙江人在外地创办的企业往往被认为是浙江企业,而浙江许多中小企业在省外的投资往往是以企业家个人的投资创业行为体现的。在很多情况下,浙江人与浙江企业的外出创业活动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对浙江人与浙江企业外出创业的经济分析,既要明确不同创业形式的区别,又要有综合的解释。